

血泪写心史 悲悯赎罪孽

——评王华的长篇小说《花河》

□何世进

在长篇新作《花河》中,佬族女作家王华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充分挖掘贵州边寨奇异的文化资源和地域风情,细腻地描述了花河边上穷人与地主爱情婚姻的纠葛,由此演绎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风云,表现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们的生活命运。小说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情节安排和人物刻画等方面都别具匠心,体现了作者可贵的创新精神。

王华不着意于对时代政治社会背景的详细交代,也不热衷于对地域风光的细腻描绘。而将这一切都融入对于主要人物及其生存命运、爱恨情仇、婚恋纠葛的深邃描写和精心刻画之中。这样她便能以极简省而又丰沛的笔墨描写和剖析人物的思想个性、精神心理,并以地质师般严谨而求实的态度探测人物复杂微妙、变幻不定的内心世界,从而呈现给读者的是新奇诡异而又波澜横生的故事情节,以及各种人物独具个性特征的情感心理。

作者将故事发生的地域安排在花河两岸,小说开篇便说:“我家乡那条河叫花河,两岸的女人都喜欢以花为名。比如红杏,比如白芍。”《花河》这部小说便以浸润着浓郁的水文化而自成特色。

主人公白芍连同妹妹红杏,真的也像水一样温柔多情,而且清纯美丽,具有花河一样长流不息而又变化莫测、大起大落的生活命运。作者开篇便描述穷怕了的姐姐白芍年仅13岁便有了清晰明确的命运安排——“嫁给一个一直被她们称为王土爷的地主”。她断然拒绝像爹妈在世时安排的那样,嫁给一个大她七八岁的贫困男人王虫。她始终想当地主的小老婆。为此,她竟然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意志将庄稼全卖了,采取以人身还债抵租的方式跻身进入地主王土家,先当丫头,再以献媚取宠谋划当小老婆。这本是人性的扭曲,甚至是灵与肉的无耻出卖,而又实为迫不得已。正是在这种一时难以令人接受的悖论中,作者展开了对白芍与红杏人生轨迹的细腻、诡异的描述,写得大起大落、大悲大痛。

地主王土腐朽败坏,到处寻花问柳、诱奸女性。王土道德如此败坏也有其特殊的因由——他一岁时爹妈便给他娶了个15岁的妻子巫香桂。小说以辛辣的文笔揭露了封建婚姻的荒唐可笑:“跟老子还是跟儿子,她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从小就on知道,女人一生,命运交到了男人手里。既然如此,她也只有认命了。”小说中的巫香桂无异一具活着的木乃伊。而贫穷的13岁的白芍则力

血泪写心史

图掌握自己的命运,那便是想当二奶,最终掌管王土的家产。她真的成为了地主的小老婆,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中,因为这一身份成为了专政对象。

白芍在新的逆境中以超人的理智,重新打量了当年穷困的未婚夫王虫。王虫不仅是佃农出身,且有着参加解放军失去右臂的荣誉光环,理所当然地当上了民兵队长。他一转身便成了当地一霸,他居心险恶,最善于算计别人。小说不厌其详地描述了他在借革命的名义所进行的罪恶活动,实不亚于当年的地主王土。

白芍亦因其市侩哲学的毒害,她灵魂中的腐败因子愈加发霉发酵。她又认准了王虫这个威风的民兵队长,以多次野合赢得王虫欢心,终于结成婚姻。作者深刻揭示了白芍因惟利是图的肮脏心理而演绎出的种种丑剧,活画出她思想心理的悖论:“10多年前选择王土是对的,现在选择王虫也是对的。”可是,面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再分配所带来的新格局,白芍凭着有限的知识见闻和狭隘自私的思想心理,等到的只能是一场悲剧。诚如区长等二品所言:“你(白芍)和王虫的婚姻,往深了看,是一场阶级斗争。是王虫染红了你,还是你染黑了王虫,我在看着,看一辈子。”

王虫善于投机取巧,伪装革命,实则灵魂丑恶,时刻像疯狗一样乱叫乱咬,以噬血赢得一己的升迁和精神的快感。他为了装扮成政治运动中的急先锋,不惜蛊惑新婚的妻子白芍“大义灭亲”,造谣陷害姐夫王禾,让她糊里糊涂地成为草菅人命、制造冤假错案的帮凶。

王虫及其后台区长等二品动辄以特务的罪名将无辜的王禾及其妻子红杏绑上审判台,大搞假枪毙。作者以侦察兵般敏锐的眼光探悉各色人物的心理反应,并详细地描写出来。惨遭迫害的王禾从姨姐白芍的眼神中“看到了她眼里杀气腾腾的仇恨,他坚信那一刻白芍手上如果有枪,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朝他来一枪”。小说描写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怎样严重地毒化了人们的内心情感,颠倒了人间本该有的是非黑白。

悲悯赎罪孽

王华之高明不单是描绘出了白芍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而在于将其置放在纷至沓来的政治运动之中,极尽龙变龙幻,深不可测、捉摸不透,从而写出了灵魂的深度。

王华亦不忘描绘白芍心性的另一面——与红杏骨肉难分的姊妹情。她既要跟随丈夫王虫狠狠地打击王禾,又不能照护住妹妹红杏。王华将白芍矛盾错综的复杂心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她为妹妹开出的药方是跟王禾离婚,最好能改嫁给权倾一时的区长等二品。等二品以“革命的原则性”严加拒斥。

白芍嫁给了王虫,自认为可以吃香喝辣,幸福美满。然而王虫很快厌弃了她。“他喝完酒就打白芍,当敌人一样打”,让白芍受不了的是,他“依然把她当地主婆看”。小说认为,像白芍这样,带着肮脏的虚荣心理,表面看相当理智,实则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观念,也就严重丧失了灵魂,往后的日子定会有无穷无尽的磨难和煎熬。

王虫因为乱搞男女关系、肆意贪污公款和生产队粮食,被清洗出革命队伍。即便这样,王虫亦自认较白芍高贵清白,甚而认为:“我没有染红白芍,倒是白芍把我染黑了。”王虫祭起了猪八戒倒打一耙的灵旗为自己增添光环。

王虫被划为坏分子后的无奈,让算命的半眼分析得一目了然:“你的前世作了孽,今生就得报应。”作者把这个人物的描写得如此精彩,一方面是因为她大胆而又巧妙地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同时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佛思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王虫坏事做尽做绝,终会有可耻的下场。

作者在小说中致力于肉体与灵魂关系的思考。梃子未考上中学时有这么一段沉思:“她觉得人的肉体就好比手,灵魂就好比沙子,她的无奈正是肉体对灵魂的无奈。”梃子对生活绝望得像投河自杀,白芍拯救的药方是划清界限,母亲红杏的回答是“梃子的身上流的是王禾的血”是无法划清界限的。于此,作者通过人物间的论辩表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当红杏屈辱含冤遭受王虫们的酷刑时,

悲悯赎罪孽

她含愤活着,具有强烈的生存意志力,因为她较姐姐白芍对社会人生有更深邃的参悟。诚如她教育绝望中的女儿梃子时所说:“你既然活着了,就得像河一样经受……你必须经受很多,才算得上是一辈子。”红杏经受炼狱般灵与肉的折磨,可依然顽强生存着,她始终不忘对于未来的期待和向往。女儿梃子从母亲红杏在经受折磨时所表出的从容淡定,得到了有力的启示:“她必须过关,像母亲一样。”从这样的女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和思想信仰的持有。

作者以极大的耐心进一步揭示白芍趋炎附势、仰仗权贵所带来的最后果。她以坑害妹妹来获取革命的光环,得来的是众人的唾弃,成为穴居岩洞的可怜虫。事态的发展比预料的更悲惨,造谣者终被谎言所杀。半眼谎称白芍叫床时叫的是反动口号,致使白芍又像红杏一样惨遭酷刑。当她痛苦地与半眼对质时,半眼却已经死了。小说再一次揭示了“害人必害己、玩火者自焚”的哲理。

小说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写出了苦难的花河两岸永不绝灭的人间温情。红杏在白芍惨遭折磨之时,主动给她喂饭,最终迫使白芍有所醒悟:“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可以策划、可以操纵的。”王禾居然活了下来,回归到红杏身边,虽满头白发,却享有一家团聚的幸福晚年。而白芍待王虫20年刑满回来时,王虫已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终给活活气死了。不久白芍也寿终正寝。小说以“一条河终于流到了尽头”结尾。

《花河》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但小说依然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太多的性描写,有时不免粗俗。尤其当王土遭枪决时,其小老婆竟执意要求与他做爱,这委实令人难以置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并无好处人,且有损小说应有的严肃而又高尚的审美品位。再者,作者有时未能与作品中的人物拉开距离,站在一定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对人物的心灵灵魂予以更清澈的审视,也就使得小说少了些本应具有的史诗品格。

民族爱 赤子情

——读曹先强的《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

□张永权

阿昌族作家曹先强的作品集《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作为“中国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作品系列”之一,最近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

曹先强出生在云南梁河县,小学毕业就辍学。他在守田棚时看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被一个乡下文化老者看见,就鼓励他重新回校读书。他死磨硬缠,说动了母亲,后来考上中央民族学院。这些年来,他创作了近200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作品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边疆文学奖。在《故乡那高高的粘枣树》中,可以看到曹先强特殊的文学创作历程,以及这位阿昌族作家的中国心、民族爱、赤子情。

曹先强的创作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影视文学、文学评论等。入选这本选集的作品,无论是什么体裁,绝大多数都是写他的民族,写他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写他故乡美丽的山水风光和丰富多彩的人文积淀,写他的父老乡亲的人生命运。一个作家把他的全部智慧和感情都献给了自己的民族、故乡和祖国,其心之热、其情之真、其爱之深,便可想而知了。

曹先强作品中,无论是对生活在祖国边疆阿昌族人民生活的反映,还是对其故乡风光、风土人情、民族文化的描写,都充满了诗情画意。可以说,呈现在曹先强笔下的祖国边疆和他的故乡,是一幅幅风光美、民俗美、人物美、文化美、生态美和极具民族特色的水墨画。这样,作家就从故乡的美丽、祖国边疆的美丽,呈现出美丽中国的一斑一叶。

一些诗人和批评家根据云南高原大地的本色,并按照地域特征,将云南的诗歌命名为“红土诗歌”或“红土地诗歌”。这种命名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当我要整体地论述云南的诗歌时,不妨借用这个名称。

在云南,生活着近30个民族的人民,这使得云南文化具有多元、兼容以及和谐共生的特征。几千年来,云南人晨耕暮歌、煮酒欢歌,区域地理的相对封闭缔造了坚韧、自在以及诗意生活的传统长期流淌于他们的血液。这种传统构成了云南诗歌写作的潜在背景。

云南当代诗歌出现过两次大的创作高潮,一次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一大批人在历经淮海战役、辽沈战役之后来到云南边地。这些人中,有军旅作家彭荆风,还有公刘、白桦、周良沛等投笔从戎的诗人,还有文学批评家冯牧等。这使云南的诗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产生影响,并引起诗坛的关注。但是这些引领云南诗歌走向新中国诗坛的诗人群体中,当时并没有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云南本土诗人出现。这一时期的诗歌有着浓厚的时代色彩,对云南的奇异山川、民族风情以及一些作家的军旅生涯的关注较多,但云南人敬畏天地自然、睿智于大形之外、宁静于自我的心、奋发于梦想尊严的文化元素、精神内核表现得并不是特别充分。改革开放以后,云南诗歌掀起了又一次高潮。于坚、雷平阳等诗人的相继出现,丰富和拓展了云南诗歌的空间。他们中的一些诗人有站在云南高原、放眼芸芸众生的辽阔胸怀。他们是以一种象征云南高远、开放、自信精神的全新面貌崛起于中国诗坛的。他们的写作体现出了可贵的“云南精神”。

说到这里,有必要阐明什么是我所理解的云南精神。其实,云南在地理和文化上从来都不是绝对封闭的状态。云南人对外界的渴望和对创新的追求并不亚于其他地区的人民。云南虽然

僻处一隅,有时也能得时代风气之先。比如,在抗日战争期间,数十万滇西军民用血肉之躯筑就了著名的滇缅公路和滇印公路,使得中国国内的抗战在捉襟见肘之时能够维持半壁江山。在后来的滇西反攻期间,同样是云南人依靠双脚和双手渡过怒江、翻越高黎贡,运送了上百万吨物资,用汗水和生命支撑了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的各个战场。是这些云南民夫和中国军人的鲜血,使具有维护尊严和自由传统的云南红土之色更加鲜艳。然战死军人有氏有姓,而死去的民夫无名无姓,但我们都不能否认,这些民夫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云南人。这应该可以总结为云南人开阔、高远的高原胸怀和坚定、担当的大山品质,也是云南人维护尊严、崇尚自由、无偿奉献精神的根本体现。

就是这种海的胸怀、山的坚定,孕育了影响每个云南人的云南传统。或者说,是因为具有这种传统,造就了云南人坚毅、自由和淳朴的品质。我认为,在这样开阔和坚韧的文化土壤之上,才容易生长出真正的诗人,才容易出现撞击时代之门的诗歌。

在任何时代,诗歌应该是一个民族集体精神和生活状态的体现。在人们看来,丰富的关键在于,他对时代转型的敏感入手,丰富了中国当代口语诗歌的表达。但我觉得,于坚是一位一直在内心歌咏云南这块沉默的边地以及他所见证的雄奇壮美的神圣高原的诗人。他的确是“一个选择了承担责任、作为现场存在的诗人”。他努

力回到位于中国这个宏大变革中的具体的云南环境和故乡,尝试着回到开放文化时空中的中华文明故乡。我认为这是云南出发、包容、神性、担当的力量在不断推动诗人的前进和思考,他用坚持个性的决心和维护多元的精神,跋涉于回到故乡的内心迁徙之路。于坚这位云南人的开放和创新精神,重新使云南诗歌迸发出诗的高地的迷人声响。

可以说,于坚、雷平阳等诗人的相继出现,使“红土诗歌”确立了在中国诗坛的地位。我同意雷平阳“是以诚恳的东方性视角,有力地抗拒了世界主义的喧嚣”的观点。云南的质朴传统和诗人在云南长大水的生存背景,使他对云南的艰难困苦体验至深,并时常被云南的坚强品质所感动。他对故乡的悲悯、观照和热爱使任何人都显得热烈、深沉和真挚。雷平阳诗歌中的云南大地,是一个神圣的祭坛,他的内心一直在朝拜这片土地,并基于土地之根,不断审视变化的时代。大地的圣坛就是人性的圣坛,在这个诗人重建的精神圣坛之下,他的诗歌姿态甚至可以放得比一棵青草更低。而就是这种一低再低的姿态,使他的诗歌彰显出可以撞击天地人心的爱的恢弘气势。他的爱,在我看来并不偏执。雷平阳对云南大地和红土高原上形影匆忙的普通人群爱和关注的指向,和云南人善良淳朴、与人为善、敬畏天地自然的传统精神更为贴近,诗人的写作和诉求的理想与“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更为贴近。

对于云南诗歌而言,于坚、雷平阳等诗人仿

我在鲁院高研班同学、蒙古族作家贺西格图说:“诗歌是个人心灵的感应,不能翻译,不能评论,也无法分析。”我初次听到这话时,感到过于玄乎。后来结合一些诗人的作品细细琢磨,感到这话并非空穴来风,毫无根据。的确有部分诗人醉心于个人情绪的主观抒写,意象模糊,晦涩难懂。读王毅然的诗,却让人感觉很轻松、很享受,就好像他跟你坐在大青树下,品着陈年淳香、回味绵长的普洱茶,敞开心扉,推心置腹地闲谈。他的诗始终取材于边地的山光水色、人文风物,用敏锐的诗歌触角去感受边地的别样心跳。

王毅然的诗有相当一部分是专注于对临沧、耿马、沧源等地自然风光的描绘,《远方的滇西南》《给南汀河》《弄么傣家寨》等诗作集中呈现了奇异迷人的边地风情。这里的风光从境外那边来,也要从国内“进口”,当大太阳照耀了山野/鲜花怒放时刻/屏国的小鸟/便成群结队地过来/旅游观光”。异国边民常到这边旅游,“买买那/连五连的笑声/也想着装上汽车捎带走”。这里的群山蓬勃地生长着春天绿色的故事,夕阳西下的小镇上,晚风呼唤着黄昏的奶名,两国的边民在清水河上的桥头依依话别,“当月亮升起在两国的天空时/这边的情歌还要到境外散步”。边民们不分国籍,坦诚相见,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像走亲戚一样在边境线上自由往返,互通有无。这完全是新时代的《清明上河图》,没有浓墨重彩的描绘和渲染,淡淡几笔,就勾勒了一幅宁静祥和的边地风光素描。《绿树丛中人的编寺》《岁月》等诗还细腻地写出了诗人隐逸的失落感和淡淡的哀愁,“我小的时候/邓丽君还没有长大/想听歌时/我就到编寺的院落里/寻觅一种声音/直到疑问打瞌睡”,而如今故地重游时,已经找不到当年踪影,只剩下小和尚身上发黄的衣服似曾相识,却早已物是人非。18年前暮色苍茫的黄昏,诗人与几个知青常常骑着水牛和慢悠悠的时间,来到一棵大青树下,倾听几位傣家少女纯情地歌唱,“那时候/天上没有下雨/我们的心却湿了”。18年后,同样是在蟋蟀吟唱的晚上,诗人看到一群一群的傣家少年,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地越过那棵熟悉的大青树,到城里的舞厅去,在姑娘的身边摇摆情绪,“这时候/不管天上是否下雨/我们的心都是一片明净”。一些珍贵的东西随着岁月流逝而无情地老去,被时间尘封,再也找寻不回来,只在记忆中留下远去的背影和模糊的足迹,令人惆怅满怀、空自感叹。这些充满灵性的边地山水、自然风物,都是从诗人的心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字字含情,句句有泪。

抓拍边地人劳动的身姿和日常生活的剪影,是王毅然诗歌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挖路的年轻人》《傣乡的雨季和女人》《佤山的孩子》等作品歌颂了边地人民的劳动及他们在劳动中陶冶出来的高尚情操。《割胶少女素描》中,高考落榜的傣家少女没有沉沦,而是在橡胶林中找到了希望和快乐,缕缕晨雾织就青春的梦幻,滴滴胶乳融入激情的希冀,每天清晨她都用山歌小调把黎明唤醒。《牧童》中,与时光一起驮在牛背上的牧童,吹着竹笛,做着生涩的梦,在夕阳西沉时,采一把蕨菜,带回去一个朴素的秋天。《沐浴》中,美丽窈窕的女人用勤劳的双手收割橡胶林,盖起了新瓦房,创造了美好的生活,还正在描绘彩色的远景,于是当她沐浴起身时,突然“立起一个美的感叹号”。这其实是矗立在诗人心中的一个感叹号,发自内心的惊叹。《傣家痴情女》写了一个美丽多情的傣家少女的内心秘密,边防军小伙子奉献青春守卫边疆,保护人民的安宁,姑娘悄悄把纯洁的爱献给了最可爱的人,“她多么愿望,把心抛进淡水里,/顺着波浪漂啊,漂到他那里,/下哨归来,让他,把这颗心轻轻捧起。”《采茶的女人》中,一项很累的农活,在诗人笔下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情怀,采茶女不是在采茶,而是在欢声笑语中剪裁阿佤山的风景,不吃苦,不言累,“她们轻轻松松地,/采摘着自己的一生”。诗人歌颂劳动,歌颂热爱劳动的人,把劳动者的身姿定格为美丽的剪影。

王毅然这些具有鲜明性的边地色彩、洋溢着泥土气息的诗歌,是诗人以平视的角度切入生活,将自己的目光视域锁定在朴素自然的边地风光、朴实无华的边民和普通的劳动场面上。以普通人的情感体验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诗人调动了大量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与诗中的描写对象融为一体,边地生活经验与诗歌内容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印证。诗人善于在生活中发掘诗情,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使读者有一种新颖的感受。诗歌的呈现过程,既是在激活遥远的记忆,又是在还原生活本身。同时,平视的眼光避免了情感隔阂,也不需要表达的符号转换。简洁明快的语言直截了当,直指事物的本质和情感的核心。但是,平实的语言并不平淡,相反,与素雅的边地风光和朴素的边地生活互相映衬,相得益彰。一些独特的诗歌意象则加强了语言的形象性和张力,显得蕴藉含蓄而又灵动异常。“在古驿道上长大的神话”、“山民挑出去的叹息”、“田野发黄的风景”、“身背时光的人”、“山歌像水一样地流”、“戴老花镜的母亲正在缝补着儿子的思念”、“在妻子粉红色的脸上发表一首已经不朦胧的诗”等等,形象化的语言有声音、有色彩,给读者以具体可感的画面。

力量和贡献同样不容忽视。在公刘、白桦等军旅诗人掀起云南诗歌创作第一高潮时,也有云南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存在。饶阶巴桑创作的《金沙江边的战士》等诗集,与云南的文化背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个时期还出现了白族诗人晓雪等少数民族诗人,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在于坚、雷平阳等诗人推动红土诗歌发展的第二次创作高潮期间,同样先后出现了阿布司南、鲁若迪基、哥布、人狼格、聂豹、柏桦、柏叶、密英文等云南少数民族诗人,他们的创作大多出于文化自发和意识自觉,为红土诗歌实现内涵丰富和精神多元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进入21世纪以后,在云南建设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的号召推动下,又涌现了艾儒木诺、泉溪、扎西尼玛、老六、爱松、尘埃、唐果、阿卓务林、温酒的丫头、陈衍强、曹翔、胡正刚、王单单等一大批各民族汉语诗人。至此,组成红土诗歌的多元元素和不同层次、不同背景的诗人群体“成型”,基本形成了既有在精神上关照故乡的总体指向,又有丰富多元的创作风格的云南诗坛格局,形成了既有领军掌旗之人、又能包容诗歌万象的云南红土诗歌特色。因为多元文化传统和生存背景的存在,红土诗歌能够有效突破“集体英雄主义”的圆囿,文化尊重与包容传统形成了和而不同的云南诗歌生态群落,这种良性的氛围将使云南汉语诗歌的创作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想,当生长在红土高原的诗人具备了“高远、开放、包容的高原情怀”,锤炼了“坚定、担当、务实的大山品质”,当我们能够在高处放开胸怀、能够在低处看见红土高原的圣光,红土诗歌必将对引领、观照、丰富和勘正云南精神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我们重新翻开云南近代历史的泛黄书页时,所有的云南诗人,都有理由为云南精神凝聚和感动,并如同我们共同的历史一样,紧紧凝聚在一起。

边地生活的精神守望

——对回族作家王毅然诗歌的一种解读

□纳张元(彝族)

在红土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少数民族诗人的